



纵乐的困惑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加]卜正民 Timothy Brook 著

方 骏 王秀丽 罗天佑译 方 骏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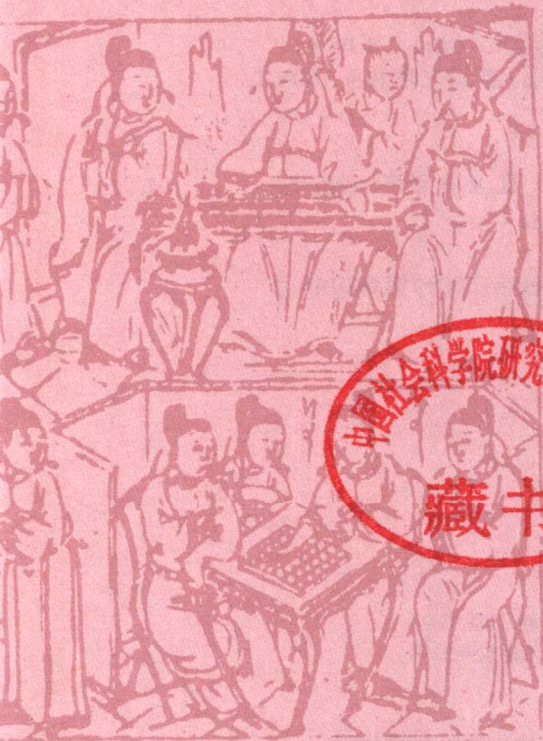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F729.48
B974

縱樂的困惑

方駿
王秀麗
羅天佑
校



明代的商業與文化

[加]卜正民 Timothy Brook 著

方駿 王秀麗 羅天佑 校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SBLS6 / 12



20022230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 1998 by Timothy Broo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加)卜正民著;
方骏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
ISBN 7-108-02006-8

I. 纵… II. ①卜…②方… III. 商业经济-经济史-
研究-中国-明代 IV. F7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145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 数 267 千字 图字 01-2001-5458
印 数 0,001-6,5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德经》中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最喜爱的一章

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

——张翰（1511—1593年）

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致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则匿影矣……

——张涛（1609年）

英文版作者序

1634年夏天，杰恩·尼克雷（Jean Nicolet, 1598—1642）从法属殖民地魁北克出发，到五大湖地区去解决那里的部落冲突——这些冲突威胁着加拿大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之毛皮贸易。尼克雷还受命在可能的情况下，航行到“西洋”。当地的土著居民带他去密歇根湖，他深信，大湖的对岸就是中国。为了给中国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准备了一些他认为拜见中国人的适物。我们不知道尼克雷如何得到一件织有花卉和彩鸟的中国锦缎，只晓得1634年时，丝织品从中国传到欧洲只有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他穿上缎袍，渡过密歇根湖，结果仅发现了格林湾。

这一错误让我们发笑，因为它与我们现有的知识大相径庭。但对尼克雷来说并非如此。我们现在远离明朝（尼克雷在它覆灭的两年前遇溺身亡），忘掉了中国曾经在欧美燃起的求知激情。

受马可·波罗那本大家极想阅读的游记的刺激，欧洲冒险家如哥伦布、探险家如尼克雷等人梦想，他们在世界另一端所发现的中国，将会是马可·波罗所描绘的拥有富丽堂皇的快乐宫殿和无与伦比的财富的世界。

他们同时也寻找另外那些更为实在、具体的东西：瓷器、尼克雷所穿的丝绸、大黄，以及其他一些明朝所产的珍奇物品。由于这些人工制品在欧洲可以卖得惊人的价钱，欧洲人纷纷寻找可以降低人口成本的航海线路。加拿大就是由于地理计算错误而引发的历史意外的后果之一，而明代中国则是导致如此巨大地理计算错误的诱惑物。

尼克雷的冒险行动并不是完全的失败。他解释道，当他身着多色缎袍出现在土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以为他是神，很虔诚地答应不再阻挠毛皮东运。我们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是否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同法国人的商业来往，也不清楚他们是否认为尼克雷划独木舟沿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支流去“西洋”简直是发疯。最终，尼克雷放弃寻找去中国的西北通道的努力，失望地返回魁北克。

让我们细想一下尼克雷的错误。也许我们和他一样，从望远镜的错误一端看世界。我们习惯地认为欧洲是尼克雷时代的世界中心，因为当时的欧洲人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后来欧洲确实成了世界的中心。但在尼克雷时代，欧洲并非世界的中心。欧洲人也许已经具备了环航全球的技术能力，但是他们的“贸易”并非建立在市场或国内自身充足生产的基础上。这种“贸易”依赖掠夺和奴役他人，破坏既有的交易网络，以极低价买入金属、毛皮和香料，然后高价售出。尼克雷想从中国购买物品，但他没有东西出售，他所能提供的只有银子——中国人眼中值得进行贸易的真正货币。他寻找去中国市场的路线，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明朝时期的世界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欧洲。

本书即是对那个中心的描述。它不是一部明朝经济史（目前说来，写一部精确的明朝经济史还不可能），而是一部描述正在发生巨大商业变化

的国度的文化史。这是一部关于商业在明代社会所起作用的书：财富所带来的快乐和这一快乐所触发的困惑。

我对明朝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复旦大学李庆甲教授向我介绍晚明哲学家著作的学生时代。那是1976年的那个令人惊悸的春天，当时上海正被夹在上层政治、“四人帮”的排商主义与淮海路上悄悄的商业本能由于时尚的引导慢慢地越过政治警戒线的状态之间。那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国开始以一种让许多国人感到震惊的速度，迅速地由社会主义滑向市场经济，激起70年代末对“哲学的贫困”的焦虑，进而走向80年代更为普遍的文化危机。处在如何调和追求利润与保持道德水准的欲望的两难中，中国人发觉他们再次生活在类似晚明时期的矛盾环境当中。从90年代的角度来看，当金钱变成无可争辩的主人，都市性爱和各种奢华交易达到晚明那样的程度，虽然明末那场辩论现在看来似乎很遥远，对于希望在国际分工中找到其位置，原有道德体系日趋解体的中国来说，一个快速的回顾显得很有必要。

明朝由王朝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为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在将这一变化呈献给读者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它与我自己所处时代的相似之处。如果我没有经历中国自70年代以后从农村国家社会主义到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浓缩旅程，我也许不会构思写这本书，或不会用眼下的方式来写。这并不是说本书的叙述源自明代以外的资料，只是想承认，每一个历史家都是从现在反思过去。

我必须向牟复礼（Frederick Mote）和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致谢，他们请我为《剑桥中国史》第8卷撰写有关明代交通和商业的一章。我发现无法将自己想写的全部内容放进那一章，结果导致此书的诞生。我

很感激崔先生给我相当的自由，让我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去完成他编撰《剑桥中国史·明代卷》的使命，并鼓励我继续撰写本书。

我的多伦多大学同事王贞平、博士研究生方骏和张云秋，在此研究项目的初期阶段，多所贡献。我很想感激 Paul Eprile 为我阅读本书的第一稿，让我在第二稿走上正轨；Roger Des Forges 审阅第二稿，并提醒我对明朝商业发达的热情评价调整到一个恰当的程度；Richard von Glahn 告诫我在第三稿里避免把明末经济简单化的若干倾向；André Gunder Frank 让我始终不要忘记将明代中国放在全球的环境里来思考。我的出版代理人 Beverley Slopen 帮助让此书以我所希望的面目呈现给读者，我也十分感激她对我的写作的信心。我很高兴有机会同加州大学出版社的 Sheila Levine 合作，她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一直鼓励我。

最后，我要向好友王国斌和我的夫人 Fay Sims 致以特别的感激。国斌以学者的博学和朋友的关心审阅全书；Fay 帮我寻找时间和地方，让我可以在眺望休伦湖蓝色湖水的同时，完成这部书稿。我常想：当年尼克雷面对休伦湖时可曾有类似的心情？

中文版作者序

当人们最后看到他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们正顶着非洲的烈日，望着大河的对岸。三人中，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非洲黑奴，另一个是呆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下的葡萄牙人。他们因所乘坐的船只出事而滞留在今天我们称作纳塔尔的非洲东部，同行的其他人已经涉水过河，消失在这片干燥和荒芜的大地上。我们不知道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姓名，但葡萄牙人是个叫做鲁博（Sebastian Lobo da Silveira）的商人。1647年2月当鲁博离开澳门的时候，他也许是那里最胖的人。他于1638年来到澳门，接任船队总管一职，不巧，他在曾经十分赚钱的远航日本商业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购买了这一航海专利，不能从中致富，他转而结交耶稣会士，不择手段地掠夺澳门的财富。当皇家行政官员对他有所阻挠时，鲁博在1643年找人将他打死。鲁博的行为在澳门街头引起的骚动并不像当时席卷华北大地的反明叛乱那样严重，在明朝被推翻的1644年，这位船队总管被新任澳督卡瓦荷（Luis de Carvalho de Sousa）拘捕，但后者未能成功没收他的财产或对他提出指控。1647年2月，卡瓦荷最终将鲁博押上开往里斯本的船只，

让他去那里接受审判。

五个月后，鲁博所乘坐的船只在非洲东南海岸失事，生还者需要从内陆徒步走到莫桑比克。鲁博因过度肥胖，加之长期奢华的生活方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致他每走几步就要歇一歇。起先他用钱雇些士兵用吊床来抬他行走。但几天之后，当这群人的食品用尽后，那些脚夫的精力和耐心也没了。在一条大河边，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抬他过去，于是为他搭了个简易帐篷，留下两个侍者后走了。

那位非洲人是葡萄牙奴隶贩子在桑给巴尔海岸购买后被送到澳门的。他是澳门众多没姓没名的黑奴之一。他们的容貌让中国人吃惊，当地人叫他们“黑鬼”。虽然纳塔尔在非洲，但船只在那里遇难对这位黑奴来讲并不意味着可以返回家乡，解除奴隶身份。关于那位中国人我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晓得他身材短小。他也许是鲁博在澳门雇来的侍从，也许是厨师，更可能是一个自己主动或儿时被人绑架后卖给外国人的奴仆。虽然奴仆在晚明相当常见，但贩卖中国人给外国人却是违反明朝法律的，明朝的地方官员为这个问题担心了几十年。一位官员于1614年前后在澳门竖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五项葡萄牙人应该遵守的规定，其中第二条是他们不可以购买“唐人子女”，但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的屏障都不能阻止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涌入澳门，“每岁不知其数”，正如当时另一位明朝官员抱怨的那样。至少在穷苦劳工的眼里，在澳门做奴仆比在福建做工要好。明朝的官员们也许不这样想，但将中国与外国人隔开的想法及做法并不能引起普通百姓的兴趣，因为同外国人做生意所带来的利润实在太可观了。

当同船的其他人丢下鲁博，渡河而去的时候，很难想像那位中国奴仆留在他身边是出于对主人的忠诚，因为鲁博的名声太坏了。继续帮主人做

饭？这更不可能，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剩余食品了。作为奴仆，在主人给他离开的自由之前，他是不能走的。一旦鲁博死了（这肯定很快就发生了），他才有可能被解放。但那时他去哪里？那个黑奴后来又怎样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惟一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那个中国人死在纳塔尔，也许是独自一人离开尘世的。

这位中国人只是生活在明代的数千万人中的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生老病死在中国境内，但有些不是，而且这些人的数目在王朝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增长。16、17世纪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也是一样。当时的世界正在日益变小，许多人（不光是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来来去去。财富和机会的引诱使得某些人长途跋涉，但更多的像那位非洲奴隶，是被强迫而不是被机会拖进这种空间移动的。那位被带到澳门的中国人应该也是这样：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或仅仅为了生存。不管是哪种情形，席卷17世纪多数地区的追求商业利益的潮汐，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将他从中国的南方海岸带到非洲海岸。

1368年，明代中国人的生活同1644年他们后人的生活有许多不同，前面讲的这个故事是其中的一个。本书是有关明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叙述。我写此书时，留意到这些全球趋势，虽然这些趋势应被看成是影响明朝中国历史的诸多复杂因素中的一部分。那位在纳塔尔的中国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所处的世界在变化，也告诉我们中国内部的变化：商业活动正日益作为一种致富的手段而被人们实践和称颂，中国不再以明朝开国君主洪武皇帝所希望的方式与世隔绝。这个故事挫败了洪武皇帝对中国的希望，我希望也挫败读者们的期望。几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看起来也许熟悉，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应该小心。明代中国人居住于一个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有着巨大差异的世界，那些相似的东西也许并不相同。

作为欧洲人后裔的加拿大人，我的社会文化背景似乎使我同鲁博而不是他的中国侍从更加接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或更加理解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的看法也许会妨碍我捕捉构成那位中国人生活经历的某些细节，但它同时也替我免除了那种基于当代中国人生活经历而自认理解他的幻觉。当然，读者和我都想发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但对明代中国来讲，我们都是陌生人。作为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是那个世界以外的人，我有着静观整个明代社会和文化风景，而又不必将明人的选择带到我自己生活中去的优势。这是一种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没有的奢侈品。他们书写中国历史，因为那是中国的；我写中国历史，是因为它提供了欧洲历史以外的另一个选择。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我则不必被束缚于将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相反，它是一份如果我选择就可以自由接受的遗产。对像我这样不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来讲，明朝是一种可以作为我的遗产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可以拥有这种没有民族义务的自由。我觉得不妨尝试一下，因为从这一立场我们可以像17世纪的祖先一样，审视那位被困在纳塔尔的中国侍从、非洲奴隶和葡萄牙商人，一样可以自由地认为那位富有、肥胖和腐败的鲁博是他们中间最奇怪的人之一。

我很高兴广大的中国读者现在能有机会读到这本书。这要归功于我的学生和朋友方骏。我很感激他愿意承担此书的译介工作，也很欣赏他的翻译技巧。我的散文写作风格并不简单，但他和他的合作者王秀丽、罗天佑极其成功地将之译成中文。我还要感谢孙竞昊为本书所提供的出色的编辑支持工作。

明代大事记

明代前期 (1368—1450)

- 1368 朱元璋建立明朝，建元洪武；下令每位知县建立四个粮仓；取消书籍税
- 1369 洪武皇帝下令每位知县开办一所县学
- 1380 洪武清洗宰相胡惟庸，直接统领六部
- 1381 全面推行里甲制度
- 1398 洪武皇帝驾崩
- 1400 现存最早的明朝土地售卖契约
- 1402 朱棣推翻其侄建文皇帝登上帝位，改元永乐
- 1405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
- 1415 大运河全面恢复使用
- 1420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
- 1429 明朝政府在大运河沿岸设立七所钞关
- 1433 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船队抵达非洲；棉花成为松江府税册上的固定税目
- 1436 南方的税粮部分转用银两支付；正统皇帝即位
- 1449 福建邓茂七“银匪”叛乱被镇压；北京官员废黜被瓦剌俘获的正统皇帝，拥立其弟为景泰皇帝

明代中期 (1450—1550)

- 1457 正统皇帝复辟，改元天顺
- 1464 湖广山地民众叛乱

- 1465 华中和华南严重水灾导致大量兴建桥梁
- 1492 运送税粮去北方边境以换取盐引的做法货币化
- 1506—1521 正德皇帝的骚扰统治
- 1506 驿站的地方负担由基于土地拥有量而不是人头的折色银承担
- 1525 兵部下令将东南沿海的多桅船截下、调查、摧毁
- 1527 粮仓数额严重减少，削弱国家赈济灾荒的能力
- 1538 席卷华中和东南长达十年之久的饥饉和瘟疫开始
- 1548 关闭沿海，禁止一切对外贸易
- 1549 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在澳门西南的上川岛开始季节性的贸易

明代晚期（1550—1644）

- 1557 葡萄牙人获许可在澳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租界
- 1567 除对日本外，海禁之令解除
- 1570 第一本路程之书在苏州刊印
- 1573—1620 万历朝
- 1581 首辅张居正实行以土地核算税项、以银两交付的一条鞭法
- 1582 最早提及私人报纸刊印
- 1587 严重的全国性饥饉
- 1602 李贽在狱中自杀
- 1629 崇祯皇帝重申国家禁止溺杀女婴；三分之一的驿站因缺钱而关闭
- 1638 邸报改用活字印刷
- 1641 大规模瘟疫席卷华北和华中
- 1642 满人袭击山东
- 1644 李自成起义军攻下北京，崇祯皇帝自杀；满人入关，宣布建立清朝

引言： 明代的四季

明王朝是在冬季的安详和静谧中开始的。至少我们的晚明作者（在此姑隐其名）身处 17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回眺通向 14 世纪的漫长的历史之路的时候，是这么想的。王朝的前半期对他来说是一幅真正的理智秩序和安定生活的图画。“家给人足，”他坚信，“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男人和女人们遵循着由来已久的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男耕女织（见图 1 和图 2），“诈伪未萌，诤争未起”。一切都按照它们应有的样子存在着。

我们的作者宣称，在他的时代一个世纪以前，王朝的静谧冬季开始让位于春季的喧闹。农业的庄严安定逐渐为喧嚣狡诈的商业世界所排挤——“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随之而来的是能力和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高下失均，锱铢共竞。”当发财的美梦点燃起贪婪的欲望的时候，维系社会的道德秩序开始让位。“互相凌夺，各自张皇。”在这个罪恶的环境中，“诈伪萌矣，诤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



图1 这幅明代中期男人收割稻谷的传统自给经济的理想图画，为一位打伞的经营地主的出现所破坏，这幅画就是站在他的角度上画的。收割者不是自耕农，而是佃农或雇工。（《便民图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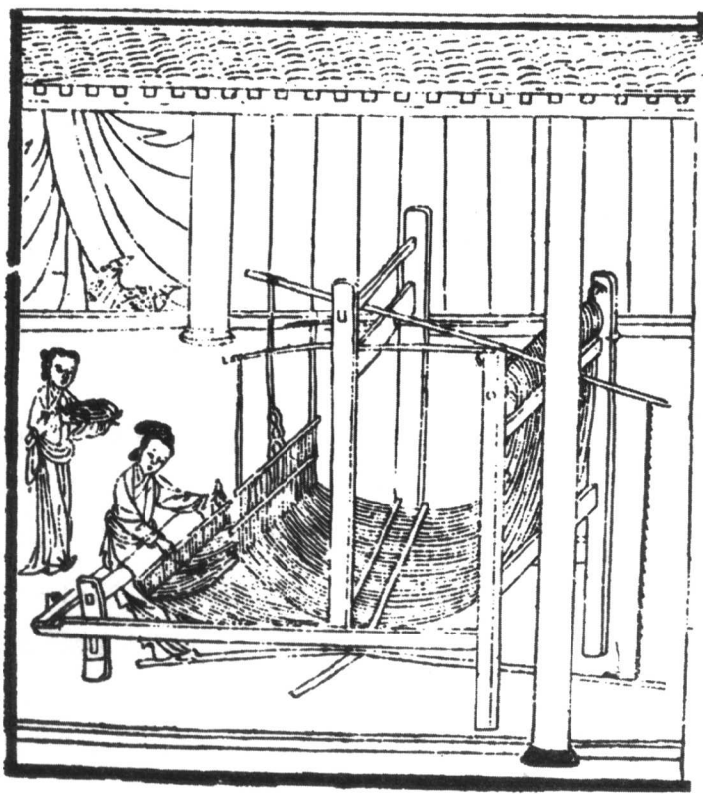


图2 这是另一幅描绘妇女在家内从事纺织的理想画面。同样，画家为织布者和她的助手安排的优雅环境也破坏了本画的真实性。由于纺织品生产的商品化，家庭内部男耕女织分工的理想画面在明代已经基本上消失了。（《便民图纂》）